

就地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

——论中国城镇化的“两基-多维”模式⁽¹⁾

叶 继红

一、引言

城镇化⁽²⁾作为发展的引擎在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已取得普遍共识，但各国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道路却有所不同。就中国来说，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³⁾，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城镇化历经了一个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其发展模式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自1983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之后，学术界就出现了城市规模之争，即何种规模的城市应得到国家的优先发展和重点支持？概括起来，主要有小城镇（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综合论。小城镇论者基于中国城镇化动力不足的现实，强调以发展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起点，积蓄力量形成向上运动的推力⁽¹⁾。大城市论者或强调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阶段性规律⁽²⁾，或强调大城市的聚集效应⁽³⁾。中等城市论者则强调发展中等城市既能减少对耕地和能源的浪费，又能避免农民盲目进城⁽⁴⁾。1990年代中期以后，前一阶段粗放型小城镇发展的问题逐渐暴露，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理论开始

(1)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编号：16JJD840006）

作者简介：叶继红，男，中国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中国语境下的一个概念，与“城市化”没有本质区别。之所以用城镇化概念，是因为其可以涵盖小城镇，而后者显然不同于城市。

(3) 陈功：《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与新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3_1817394.html。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计算方法为：一个国家（地区）在城镇居住时间达6个月以上的人口，即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国（地区）全部人口的比重。在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不仅包括户籍城镇人口，还包括迁移至城镇居住时间达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

强调小城镇应适度地集中，以发展县城或县域中心城镇为主^⑤，逐步形成县域内的劳动力流动^⑥。而综合论者根据中国“多梯度社会结构”的发展现状，认为应走“复合型的城市化道路”，力图建构中国“发展极城市—中心城市—小城镇”地域空间一体化网状结构^⑦。

由城市规模之争自然引出了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就地城镇化强调农业剩余人口就地就近向小城镇转移，异地城镇化强调远距离地向大城市转移。支持就地城镇化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可以降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成本，也有利于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且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和人口流动规律^⑧。支持异地城镇化的学者认为，由于异地转移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就地转移劳动力，因而异地转移方式应该是劳动力转移政策的较优选择方向^⑨。综合论者认为，就地消化和异地转移都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途径^⑩，究竟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劳动力的就业偏好^⑪、发展预期、家庭状况等因素^⑫。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种城镇化模式本身没有高下之分，而是适用性的问题。实质上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两者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互补共生的，也就是，不同论者的争论完全可以达成和解。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模式可以进行相互转化，并提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两基—多维”模式：“两基”即是依托本地与异地两个支点而形成的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两种基本类型，“多维”是指两种类型得以实现的多种方式，即各具特色的农民非农化方式，从而尝试对中国特色城镇化实践做出初步的理论解释。

二、就地城镇化与实现路径

“就地城镇化”是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在原居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就地非农化、市民化的过程。就地城镇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⑬：一是就业结构上实现新的产业就业；二是空间形态上从分散居住转变为人口较为集中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的过程。与就地城镇化相近的概念是“就近城镇化”，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一般来说，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内容。学术界往往合在一起使用，称为“就地就近城镇化”或“就近就地城镇化”。

“就近”是相对于跨省和跨地级市的长距离流动而言，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④。根据空间范围，从村内就地转化、小城镇就地转化、县域内就地转化到地级市内就地转化都被界定为就地城镇化^⑤。因此，本文所指的是一种广义上的就地城镇化，包含了就近城镇化的内涵，是指在地级市、县域与乡镇范围内实现的城镇化。

从就地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来看，主要包括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小城镇及特色小镇，以及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等方式。

1. 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民非农化。城镇化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④发达的乡村工业对劳动力产生了需求，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了契机。一部分农民开始“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实现了农业人口的就地就近转移。费孝通将这种城镇化方式概括为“苏南模式”。正如费孝通所言：“他们原是住在乡村里种田的农民，这几年他们在农业之外找到了新的活路。有许多就在村里或镇上社办办的工厂里当上了工人。这种人大多还是住在乡村里。……从劳动者来说是离土不离乡，从工业来说是从集中在大城市的形式扩散到广大乡村中去。”^⑤也就是说，依靠发展社队工业和乡镇工（企）业，农民实现了就地就近转移而不必迁移到大中城市。苏南乡村工业作为“公社或生产队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具有较强的集体经济属性。这与以家庭企业与私营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温州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通过发展小城镇与特色小镇实现农民就地就近转移。费孝通较早早在苏州吴江县（现吴江区）的调研中发现了小城镇^⑤对于农民转移就业的重要作用。他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指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作为乡村工业“集中的地方”，小城镇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在吴江县的七个县属镇内“存在着另外两种工业：一种是县属工业（包括全民或集体），另一种是镇办工业。县属工业的发展较早，

(4) 广义上的苏南是指中国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五市，狭义的苏南，仅指江苏东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

(5) 对于小城镇的界定，目前主要存在4种争论：第一，小城镇=小城市+建制镇+集镇；第二，小城镇=小城市+建制镇；第三，小城镇=建制镇；第四，小城镇=建制镇+集镇（李明超：《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研究回顾与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12年第3期）。由于小城镇事实上是乡的中心，费孝通因此主张将“小城镇”和那些“日中为市”的“集”统一称呼为“集镇”（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本文所指的小城镇是建制镇与集镇的合集。

一般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办的。它对保住小城镇一部分人口和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是起了作用的”。镇办工业“实际上是残留在镇上的剩余劳力进行生产自救”的组织^⑦。可见当时的苏南小城镇，主要是通过发展县办或镇办工业企业来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据统计，1978-1989年间，苏南农业劳动力大约半数转向了非农产业，这些人绝大部分就地进入了乡镇企业^⑧。就整个江苏来说，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占比11%增长到90年代初的近三分之一（表1），很好地体现了依托乡镇企业而得以发展的小城镇在吸纳农民就业中的“蓄水池”作用。

表1 改革开放后江苏省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情况^⑨

年份	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万人)	乡村劳动力(万人)	比重(%)
1978	249.09	2256.69	11.00
1985	511.66	2598.12	19.70
1990	896.17	2786.86	32.20
1995	924.71	2773.04	33.30
1998	837.40	2735.91	30.60

2016年之后，一种区别于行政建制镇的、全新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特色小镇被提了出来并得到快速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载体，特色小镇具有产业“特而强”、功能“有机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等特点^⑩。从类型来看，特色小镇大致分为历史文化型、城郊休闲型、新兴产业型、特色产业型、交通区位型、资源禀赋型、生态旅游型、高端制造业、金融创新型、时尚创意型八大类^⑪。2016年10月，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将127个行政建制镇认定为“中国特色小镇”。2017年8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建村〔2017〕178号），将276个行政建制镇认定为“全国特色小镇”。与此同时，各个省份也开始积极推进本区域内的特色小镇命名或创建工作。以江苏省为例，2016年12月，江苏省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培育创建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苏政发〔2016〕176号），要求培育创建一批具有江苏特点的特色小镇。江苏先后发布两批特色小镇名单。目前江苏共有国家级特色小镇22个，

省级特色小镇56个。根据特色产业类型划分,这些特色小镇主要有“高端制造小镇”(39.3%)、“创意产业小镇”(25.0%)、“第一代信息技术小镇”(14.3%)、“历史经典小镇”(8.9%)、“健康养老小镇”(8.9%)等(图1)。这些特色小镇通过打造“一镇一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优势,发挥了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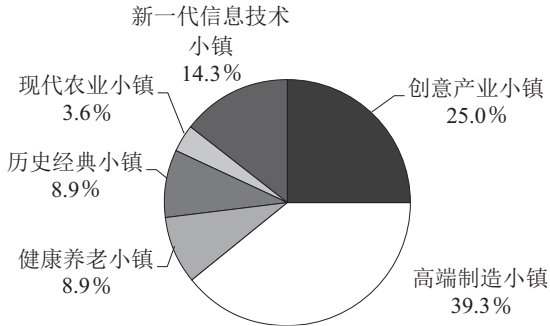


图1 江苏特色小镇的基本类型

以江苏苏绣小镇为例,苏绣小镇在江苏首批(2017年)特色小镇(历史经典小镇)之列,同时获得2018年度首批省级特色小镇考核“优秀”等第。苏绣小镇坐落在苏州高新区镇湖镇(现改为镇湖街道),地处苏州市西部太湖之滨。刺绣、织席、养蚕和捕鱼也成为了镇湖的传统副业,其中尤以刺绣为盛。尤其改革开放之后,镇湖的刺绣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政府部门专门打造了一条1.7公里长的绣品街,吸引了众多的乡下绣女来镇上开店,前店后坊的一条街成为镇湖独特的景观,绣品街也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绣品批发市场。刺绣成为了地方经济的一大特色产业与支柱产业。目前镇湖2万人口中有8千绣女,5千余人从事刺绣相关行业,2/3的人口从事刺绣、2/3的收入来自刺绣,镇湖因此被称为“绣”出来的小镇^②。不仅如此,镇湖特色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小镇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镇15分钟社区生活圈内,幼儿园、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已投入使用^③,从而为转移至小镇的农村人口享受市民化生活提供了保障。

3. 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实现农转居。“农民集中居住”来自中国发达地区农村的“三集中”实践,即“农民向社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

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江苏是较早推行农村“三集中”政策的省份之一⁽⁶⁾。大约从2000年起，苏南地区农村开始尝试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工程。随后这一做法作为典型经验便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开来。按照江苏全省镇村布局规划编制方案，自2006年之后的20-25年内，全省25万个自然村将逐步撤并为4万多个农村居民点。由于江苏农民集中居住做法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⁷⁾的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高度一致，于是农民集中居住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意义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将农民转变为居民。农民集中居住通常伴随着土地的被征用和户口的农转非——即将其农业户口转变为居民户口。相应地，这些新市民将就地转向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实现就业方式的转型。二是改善了农转居新市民的居住环境。恰如学者所言：“从传统的农村住宅向城市式多层建筑、从传统村落向农村住宅社区的转变”⁽⁸⁾，是21世纪初中国农村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新建的居住区不但基础设施齐全，而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网点、金融邮电和市政公用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应有尽有，从而形成了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和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三是提升了农转居新市民的生活质量。以江苏省为例，集中居住后，93.5%的居民家庭都进行了装修；几乎九成以上的居民家庭都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设备，而数字电视、电脑、私家车的拥有率也占到了相当的比例⁽⁹⁾。由此可见，农民集中居住对于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异地城镇化与城市嵌入

异地城镇化是与就地城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农民通过跨区域空间转移，特别是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迁移流动，最终在流入地实现城镇

(6) 其他地区也较早地进行了实践探索，如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实施“三集中”工程。早在2003年底，全县就新建农民小区66个，总面积161万平方米。其中，建成公寓式小区10个，面积26万平方米（倪鹏飞等：《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城乡共赢：以成都市为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浙江省宁波市进行的“三改一化”，即撤村建居、股份合作制改革、旧村改造、实现农村城市化。“三改一化”于2001年开始试点，于2004年全面推开（陆学艺：《城郊农村实现城市化的好模式：宁波江东区调查》，《今日中国论坛》2007年第11期）。

(7) 2017年10月，国家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更新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化的一种模式”^⑧。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表明，2015年外出农民工约1.7亿人，其中跨省流动7745万人，而省内流动到省会城市的还有2059万人。如果将跨地级市作为“就近”和“异地”的分界线，可见外出农民工中“异地”流动的比例应该超过一半（表2）。从本课题组对安徽省西部一个行政村（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来看，就地城镇化为48人，异地城镇化为121人（表3），异地城镇化转移的人口为就地城镇化转移人口的2.5倍。

表2 2015年外出农民工流向地区分布及构成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小城镇	其他	合计
外出农民工总量(万人)	1460	3811	5919	5621	73	16884
其中：跨省流动	1188	1752	3258	1473	73	7745
省内向外流动	272	2059	2660	4148	0	9139
外出农民工构成(%)	8.6	22.6	35.1	33.3	0.4	100.0
其中：跨省流动	15.3	22.6	42.1	19.0	0.9	100.0
省内乡外流动	3.0	22.5	29.1	45.4	0.0	100.0

表3 安徽省霍山县单龙寺镇单龙寺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⁸⁾

	本地就业			本省就业		省外就业		合计
	村镇	县城	六安	合肥	省内其他城市	杭州	省外其他城市	
福利	7	10	1	7	1	20	6	52
贩上	2	3	0	6	0	15	1	27
榜上	5	2	0	9	1	24	2	43
建新	10	6	0	7	3	16	5	47
合计	24	23	1	29	5	75	12	169

其中：

福利：省内其他城市阜阳1人，外省其他城市为温州1人、深圳1人、汕头1人、宁波2人、北京1人；

贩上：省外其他城市宁波1人；

榜上：省内其他城市为蚌埠1人；省外其他城市为金华1人、北京1人；

建新：省内其他城市芜湖3人；省外其他城市为宁波2人、海南1人、南京2人。

从异地城镇化的实现方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整体嵌入与分散嵌入两大

(8) 本次调查选取的范围是从该行政村所辖的22个村民小组中抽取的4个村民小组，调查时间为2021年1月，调查人为项金玉。

类。整体嵌入是指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依托原先的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聚居方式。作为聚居的结果便成了城市的“族群飞地”，其中以北京“浙江村”⁽⁹⁾最为有名。浙江村并非指浙江人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的新村落，而是指浙江人在该地通过在城郊村租住聚居而形成的“城中村”。不同于那些仅作为外来人口居住地的普通城中村，“浙江村”复制了作为农民工流出地家乡的温州的私营化经营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将原家乡的经营模式迁移到了异地。故而学术界将浙江村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进入城市的方式”，即“产业-社区型进入”⁽¹⁰⁾。这种方式有以下特点：第一，聚居人口来自同一户籍所在地（温州市），形成了一个族群飞地。第二，成员频繁互动生成了一定的族群意识与社会资本。第三，总体上形成了应对城市社会排斥、抱团取暖的组织化与集团化力量。“浙江村”尽管曾因脏乱差问题而被地方政府多次清理整治，人员遭驱赶，但在多方努力下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¹⁰⁾。因而可以认为北京“浙江村”是农民异地城镇化、嵌入城市的重要形式。

如果说北京“浙江村”是进城农民自发聚居而形成的，那么由地方政府专门为农民工建造的“打工楼”则可以看成是农民工整体嵌入城市的又一种方式。在苏州市高新区枫桥街道，地方政府为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采用集中居住、集中服务、集中经营的模式，先后建造了景山公寓、木桥公寓两个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景山公寓拥有宿舍1545间，目前居住着来自一家大型台企的1.5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而设有1438间宿舍的木桥公寓，则居住着另一家台资企业一万余名员工。这两座“打工楼”集服务、管理、生活三大功能于一体。公寓内银行、超市、健身房、药店、医务室、通讯服务网点、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法制学校、心理辅导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公寓内还定期播放露天电影，开展文体活动。

而在昆山市——苏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地方政府也采用了外来农民工集中居住方式。早在2002年昆山市政府就制定了《昆山市外来人员“集居

(9) “浙江村”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在北京丰台区一带形成的聚居区，人口最多时曾达近十万。

(10) 参见孙忠焕：《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30年（二十二）》、《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30年（二十三）》（《杭州政协》2010年第11-12期）。当然也要注意到北京“浙江村”后来发生的一些变化，如从非正规经济到被纳入正规经济后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的丧失（项飙：《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二十一世纪》2017年第1期）。

工程”实施意见》，引导企业实利用工人员的内部集中居住，同时做好社会面外来人员的集中居住的宣传落实工作。昆山市的外来人员集中居住点建设形成了“三三制”的模式，即企业内部校园式、社会面上旅馆式、建筑工地营房式等三种形式，以及高档次公寓型、中档次宿舍型、低档次住户型等三个档次。尤其是高档公寓内，都配有电视、空调、卫生间、热水器等生活设施，集宿区内设有超市、网吧、文化活动中心，极大地方便了入住者的生活，让外来人口有了“家”的感觉。外来农民工实现集中居住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集体公寓或宿舍发挥了农民工保障房的作用，解决了农民工独自在外租房的麻烦。第二，集宿区完善的服务设施与良好的居住环境提升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使他们体验和享受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第三，解决了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大量集聚而产生的违章搭建、环境卫生和治安问题，便于规范化管理。据介绍，景山公寓投入使用1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¹¹⁾。

相对于北京“浙江村”与苏州“打工楼”这种整体嵌入方式，大多数农民工还是以分散的形式单个地或与家庭成员一起栖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平均户规模为2.7人，在流入地居住的以2-3人为主。其中，1人户占18.1%，2人户占25.4%，三人户占31.7%，4人户占18.4%，5人户及以上户占6.5%^⑧。这表明，八成以上的流动人口都以家庭化的形式嵌入城市的。虽然分散嵌入很难形成诸如北京“浙江村”一样的组织化力量，以抗拒来自城市的社会排斥。但相比于单个个体，以家庭的形式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的关系

(一) 就地城镇化为异地城镇化提供了中转

从理论上讲，农民在非农化与市民化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三步走战略或三种选择：第一步是向中心村或小城镇（包括县城）转移；第二步，是向所在地级市转移；第三步，是向省城或其他城市转移。第一步与第二步就是就地城镇化的过程，而第三步就是异地城镇化的过程。当然，在实践中，农

(11) 张伟敏：《打工楼迈进“4.0时代”》，苏州高新区新闻网，<http://news.snd.gov.cn/news/31434.html>。

民也可能从第一步直接跨到第三步，不需要地级市作为中转。以下这则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主 XWL 高中毕业后先在家乡县城打工，后来去了广州。他说：

高中还有半年我就没念（书）了，反正拿到了毕业证。那时候我爸说我太小，出去打工怕没人要，让我先在霍山打打零工。就是过渡一下，差不多干了一年半吧，我就去广州了。当时在家考了一个初级的钳工证嘛，然后家门口人给我介绍了一下，说他的战友在广州那边要人，然后我就去了。讲实话霍山只适合养老，要奋斗还是去大城市。霍山的市场太小了，转来转去就那么大。到外面打工最起码你能挣到钱，但是你的工资跑不赢外面的房价，要是没有公积金这种那压力好一点，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矛盾。在霍山压力小，买房什么都能承担的起，但是你挣不到钱，大城市能挣到钱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辈子留在那。

农民作为理性行动者选择哪种方式要取决于农民家庭的具体状况、本地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拟迁入城市的发展机会等。如果首先转移至小城镇或地级市，再进一步转移到大城市，那么就地城镇化就成为了异地城镇化的中转。

（二）就地城镇化为异地城镇化提供了回路

同样，当农民在大中城市的就业与生存压力较大，这时农民也可以选择退回农村或小城镇，成为返乡农民工。当然并非所有的返乡农民工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而回乡，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工中的精英群体返乡是为了创业。据统计，截至2020年8月底，全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到1700万人^②。于是，异地城镇化就转变成了就地城镇化，即先通过异地城镇化入城，再返乡就近就地就业。就地城镇化符合农民工未来的流动趋势。一方面，当前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城市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使得一、二线发达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出现了劳动力逐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也为返乡人员就业提供了契机。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会出台一系列支持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政策，也会吸引一些城市资本下乡兴办企业，从而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而当返乡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能照顾到家庭

时，那些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三) 异地城镇化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外援

返乡农民工尤其是那些返乡创业者，他们从城市带回了资金、技术、信息与管理经验，在家乡兴办企业或经济实体，吸纳和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避免了异地城镇化导致的众多农村人口远距离迁徙。据调查，平均每名返乡创业者能带动四人左右的新就业^⑩。以四川省为例，2020年四川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达到80.6万人，实现创业产值6200亿元，吸纳就业311.7万人^⑪。

以下两则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例一：X先生和妻子早年从安徽霍山县单龙寺镇单龙寺村外出打工，2010年夫妻二人从杭州返乡创业。他说：

当时我们在杭州也是干了有七八年了，2010年前后老家农村这边盖房子的很多，都在翻新盖新房子，门窗生意好做，我们商量回来干。大概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从杭州回来了。主要是打工打烦了。打工是给人家干活，你喝汤人家吃肉，那是挣不到大钱，我们干上七八年了，讲起来都可怜，累的没有话讲，厂里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当时呢，我们那个厂是专门做门窗生意，叫西州将军，那几年房地产起步，生意好，老板想拓展市场，我们就想接下来，等于讲做分销商，回来霍山做总代理，结果就回来了。

案例二：W先生2001年从河南老家到北京打工，做过推销员，跑过货运。2015年回村创业，和其弟弟一起开办了一个服装印花厂。他说：

在北京我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推销员，那时都要敲门推销，你一敲门，人家就打电话叫保安过来。那保安就上来了，两人胳膊一架，包给你一扔，直接架出去了。后来积攒一点钱后，买了个货车，在那跑货车，整天整夜地干，很不容易。回想起来，我在广告公司两年半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使我自己成长了不少，那时候的经历确实有用。现在我这厂里招的工人有十来个，主要是附近的村里的妇女，在家里闲着没事正好来我这里干干还能赚点零花钱。

不难看出，X能够返乡创业是凭借在城市打工积累的社会资本，获得了原打工企业在霍山总代理的机会。W返乡创业的成功离不开其在城市积累的经验、资本和对能力的磨炼。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城镇化能够为就地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外部援助与支持，从而反过来助推本地人就地就近非农化与市民化。

从以上三点分析不难看出，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模式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形成互补共生关系。从主体的角度，农民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可以选择就地就近城镇化，也可以选择迁移至大城市进行异地城镇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的互补共生，与上述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是一致的。

四、两种城镇化模式的不足及其超越

(一) 两种城镇化模式的不足之处

就地城镇化代表了以发展乡村（镇）工业、小城镇（特色小镇）和推进乡村就地整治改造或农民集中居住为表征的城镇化模式。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资源利用较为粗放。传统的乡村（镇）工业技术含量不高，资源利用较为粗放，“村村冒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二是小城镇的集聚辐射能力不强。相较于大城市，小城镇对人口的集聚度不高，一些镇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能力有限。目前中心镇的集聚辐射能力总体较好，而普通镇的集聚辐射能力相对不足。以浙江为例，该省200个省级中心镇的平均镇域面积为105平方公里，镇区面积9.1平方公里，分别是其他普通建制镇的1.4倍和1.8倍；中心镇人口平均6.6万人，镇区人口2.8万人，分别是其它建制镇的2.1倍和2.8倍^②。三是小城镇对于农民市民化的型塑作用不及大中城市。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我们把城市化的终极目标看作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性特征的极大彰显的话，很显然，发展大城市比发展小城镇更能够体现这一特征。”^③

对于异地城镇化的弊端，学术界诟病最多的是流动人口向大城市过于集中造成了各种“城市病”，以及人户分离造成的农村“三留守”（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病”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城市贫困、房价高涨、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资源能源紧张等方面。“城市病”的本质是城市发展速度和扩张规模超过了城市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⑳,这显然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城市有关。与农村“三留守”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空心化现象。农村空心化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等的空心化,其中人口因素最为关键。不难看出,作为异地城镇化副产品的“三留守”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和流失所致。

(二) 两种城镇化模式的功能优化

就地城镇化存在的种种不足不能成为否定该城镇化模式的价值与意义的充分理由。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县域就地城镇化的作用愈加凸显,在并非任一农民都适合异地城镇化的情况下,就地城镇化的优势还是较为明显。尤其重要的是,就地城镇化满足了农民家庭的实际需要以及农民的心理需求。正如斯科特所言:“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农民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经验反映了安全第一的逻辑结论。”^㉑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地城镇化是一种安全城镇化,它满足了农民安全城镇化的需求。

同样,“城市病”和“三留守”问题也不能成为否定异地城镇化模式的价值与意义的充分理由。有学者认为,虽然“三留守”问题导致农民家庭的分离,“却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故而,“留守”是农民家庭的“选择与权利”,是弱势农民获得“基本保障”和“底线救济”的方式^㉒。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农民家庭来说,“留守”有其现实必要性,“留守”未尝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正确选择。辩证地看,城镇化的两种模式中一方的不足正好是另一方的优势所在,或者说可以通过另一方得以克服和弥补。

五、中国城镇化的“两基-多维”模式

应该说,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这两种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孰优孰劣,只是针对不同对象具有不同的适用性。二者的区别表面上看是距离远近的问题,实则是发展战略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即是“留守发展”还是寻求“外

出发展”？是优先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

基于中国区域差异较大的基本国情，城镇化并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正如费孝通所言：“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③ 费孝通先后概括出了“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模式）、“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珠江模式”（三来一补企业）“民权模式”（公司+农户）、“侨乡模式”（侨胞投资兴办企业）等。这些模式代表了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农民“生财之道”的多样性，体现了城镇化因地制宜的特点。这其中既有就地城镇化方式，也有异地城镇化方式，如温州农民外出经商后回乡办厂，就是先异地城镇化后就地城镇化。因此，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是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和单元，是城镇化发展的两个基点，而实现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则有多种方式和途径。

如果将由乡到城看作是“（中心）村—小城镇（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的连续体，相应地可以形成以下推进方式：一、以中心村为载体的城镇化。主要通过合村并居的方式，加强中心村建设，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居住。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二、以小城镇（市）为载体的城镇化。主要通过小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建设来推进城镇化。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凸显了小城镇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地位。三、以大中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主要通过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建设来推进城镇化。四、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镇化。主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来推进城镇化。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从而凸显了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可以看作是城镇化从乡村到城市的整个连续体。显然，建设（中心）村、小城镇（市）、中等城市，引导人口向（中心）村、小城镇（市）、中等城市转移就是一种就地城镇化模式，而建设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引

导人口向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转移就是一种异地城镇化道路，因而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互为补充。这种“两基—多维”模式与费孝通关于由乡村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直至形成“全国一盘棋”^⑳的城镇化思想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①邹农俭：《关于城市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 ②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 ③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 ④刘纯彬：《中国城市化要以建设中等城市为重点》，《财经科学》1988年第7期。
- ⑤辜胜阻、李永周：《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方向》，《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6期。
- ⑥李强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 ⑦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 ⑧李强、陈振华、张莹：《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⑨杜鑫：《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08年第1期。
- ⑩张诚：《非农化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2期。
- ⑪张务伟、张福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对山东省17地市1873户农民的调查》，《农村经济》2008年第6期。
- ⑫罗明忠：《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1期。
- ⑬李强、张莹、陈振华：《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 ⑭李强、陈振华、张莹：《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⑮李健、杨传开、宁越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机制与路径》，《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
- ⑯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4页。
- ⑰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194页。
- ⑱殷晓岚：《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64页。
- ⑲夏鸣等编《江苏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 ⑳卫龙宝、史新杰:《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建议》,《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㉑刘国斌、高英杰、王福林:《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 ㉒何聪、申琳:《苏州镇湖:一个“绣”出来的小镇》,《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5日。
- ㉓邱海峰、汲梦喆:《特色小镇,多些“特色”少些“名不副实”》,《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25日。
- ㉔Rosenberg, L. Urbanizing the Rural. China Perspectives, 2013, 3(95): 63-71.
- ㉕叶继红:《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4-97页。
- ㉖杨风:《异地城镇化更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转型》,《中国人口报》2014年10月27日。
- ㉗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 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 ㉙姚雪青:《让农民返乡创业更有底气》,《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2日。
- ㉚邱玥:《人社部详解新措施——全方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光明日报》2018年1月20日。
- ㉛刘春华:《80.6万农民工返乡兴起“创业经济”》,《四川日报》2021年1月13日。
- ㉜郑小碧、孙晓雨:《中心镇人口集聚的模式、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㉝文军:《回到“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战略转型与意义重建》,《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 ㉞焦晓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困境、重点与对策探析——“城市病”治理的另一种思路》,《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 ㉟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 ㊱贺雪峰:《留守问题不应一概而论》,《决策》2019年第5期。
- ㊲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页。
- ㊳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7页。

Summary

In-site Urbanization or Off-site Urbanization

On the Basic Types and Re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YE Jihong

Urbanization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for a country to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big problem and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types, urban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In-site urbanization and Off-site urbanization. The former is mainly realized by developing rural industry, small towns and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promoting farmers' centralized residence, while the latter is mainly realized by overall embedding and decentralized embed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relationship, In-site urbanization provides a transit and loop for Off-site urbanization, and Off-site urbanization provides foreign aid for In-site urbanization, so the two complement and coexist. Dialectically, the deficiency of one of the two modes of urbanization is just the advantage of the other, or it can be overcome and made up by the other. They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refore, China's future urbanization road should real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road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two bases".

Key words: In-site urbanization; Off-site urbanization; type and mode; "two base-multi dimension" mode